

# On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GONG Qian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September 14, 2022

Accepted: November 20, 2022

Published: March 30,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GONG Qian. (2023). On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Leaders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1), 104–11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2](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2)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1.012>

**Abstract:** The special status and role of political leaders are reflected in their direct participation in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their ability to guide people's values and behavior choices internally,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and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xternally. Furthermore, the process of political leaders in the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have its own political cognition, such as political values, political attitude and diplomatic idea will affect diplomatic decision-making cognitive orientation, and stat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od or worse effect, then accelerate or slow down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ooperation between countries. Robert Jervis' theory of false perception shows that the cognitive orient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which leads to conflicts and even wars between countries. Therefor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al driving force of political leaders is their adherence to positive and enterprising political values.

**Keywords:** a political leader; decision making concep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ispercep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Gong Qian holds a Ph. D. degree in Law. She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 Her academic interest li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 政治心理視角下政治領導者對國際合作的影響論析

宮 倩

長春師範大學

**摘 要:** 政治領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體現在他直接參與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內能夠引導民眾的價

值觀和行為選擇,對外影響了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秩序的穩定。進一步而言,政治領袖在進行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認知,如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和外交理念等認知取向會對外交決策產生影響,從而對國家之間關係的走向發生良好或惡化效應,進而加速或延緩了國家間合作的建立和發展進程。羅伯特·傑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表明政治領袖的認知取向對於外交決策的負面影響,進而使得國家之間處於衝突甚至戰爭。因此,對於國際合作而言,政治領袖所真正發揮驅動力作用的實質是其秉承正向、積極進取的政治價值觀。

**關鍵詞:** 政治領袖;決策理念;國際合作;錯誤知覺

**基金項目:** 中國吉林省長春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全球治理進程中的東北亞區域治理路徑研究」。

## 引言

政治心理學是政治學和心理學交叉的跨學科學術領域,廣泛關注從心理學角度理解政治和政治過程、結構、感知、經驗和行為。它經歷了快速發展,已成為社會科學中一個有影響力的研究領域。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和實踐方法被應用於許多背景下,包括領導角色、國內和外交政策制定、種族暴力、戰爭、種族滅絕、群體動力學和衝突、種族主義態度和行為、投票、民族主義和政治極端主義。歷史上,政治心理學大量採用旨在探索人類社會和政治行為的本質和潛在基礎的社會心理學方法,應用了更廣泛的理論和方法。在國際政治活動中,一國的外交政策往往是通過個人決策,進而影響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至影響國際體系結構。勒龐認為,「在使群體形成意見並取得一致方面,領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他的意志是群體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sup>①</sup>政治領袖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體現在他直接參與國家對內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對內能夠引導民眾的價值觀和行為選擇,對外影響了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國際秩序的穩定。進一步而言,政治領袖在進行外交決策的過程中,其自身所具有的政治認知,如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和外交理念等認知取向會對外交決策產生影響,從而對國家之間關係的走向發生良好或惡化效應,進而加速或延緩了國家間合作的建立和發展進程。羅伯特·傑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表明政治領袖的認知取向對於外交決策的負面影響,進而使得國家之間處於衝突甚至戰爭。因此,對於國際合作而言,政治領袖所真正發揮驅動力作用的實質是其秉承正向、積極進取的政治價值觀。

### 一、政治領袖影響外交決策的政治心理學分析

政治領袖是「階級鬥爭和社會分工的產物,是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在不同階級的長期的政治事件中湧現出來,具有卓越政治見識和接觸政治才能,對歷史發展有重要影響、在本階級中擁有最高權威的政治人物。」<sup>②</sup>政治領袖可以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可以是某個政治組織的領導者,還可以是對某一階段的政治發展過程起關鍵作用並產生重要政治後果的政治參與者、宣導者、組織者與決策者。本文所探討的政治領袖是一國的元首或政府首腦。政治領袖不僅僅是社會中簡單的管理者與統治者,而且他們還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政治領袖擁有重大的政治決策權,決定著其所代表的階級的性質和結構,是特定階級、集團和民族的政治領導核心,對政治發展有重要影響。馬克思主義形象地把國家喻為「國家機器」,而政治領袖在一定意義上能夠全域地、高屋建瓴地駕馭「國家機器」,使之合理有效地運轉。政治領袖所處的地位和作用,使得我們在研究國際關係問題時無法忽視這一個人角色。無論是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還是國內經濟社會的向前運行都離不開代表國家的這一個人主體。國家對外政策的實施是政治領袖主導外交決策的結果。從政治領袖個人而言,如何進行外交決策是建立在他對時局的判斷、對外界環境的認識等政治思想意識、政治價值觀、政治態度之上,這些認知傾向促使政治領袖進行決策選擇,從而引導了對外政策的走



向,對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起到阻礙或推動的作用。國際政治學中認知學派的代表人物羅伯特·傑維斯闡述了一國決策者的認知對外交決策和國家行為的影響,即由於認知的局限性、資訊不對稱等因素使得決策者可能往往容易產生錯誤知覺,誤解其他國家決策者的意圖和行為,從而導致錯誤判斷和行為。傑維斯以幾種錯誤知覺來具體說明決策者的認知對外交決策和國家行為的影響。

1. 統一性知覺。社會認知理論認為,人類的認知具有統一性特點,這一特點表現為認知主體「總是採用直接而同一的方式把事物知覺為統一的整體,而不是知覺為一群個別的感覺」。<sup>⑦</sup>基於此,傑維斯指出,統一性知覺有時容易使認知主體忽視事物的複雜性,導致判斷失誤,進而對外決策也存在偏差。儘管決策者清楚地瞭解到國內的政府部門並不是完全的統一,即最終的政策結果往往是各部門討價還價的結果,但決策者還是容易過高地估計國家在執行政策方面保持一致性的可能。因此,統一性知覺使得決策者同樣會過高地估計對方的決策者掌控自己國家權力的程度,認為對方的決策者可以將自身的意志強加於其國家內部的各政府部門。由此,一國的行為通常被視為是統一協調的行為。「對方國家內部在某一問題上決定政策的利益聯盟在其他問題上可能不會形成聯盟;或者,即使在兩個問題上均是同一組人決定政策,在一個問題上他們重點考慮的利益在另一個問題上就可能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sup>⑧</sup>傑維斯指出,這種認知的結果導致一國的決策者的決策行為出現錯誤:一方面,傾向於將一組事件的發生看作是其他國家的決策者有計劃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具有整體利益觀念的行動,而不是由於對方偶爾愚蠢的錯誤、國內政府部門之間的競爭及其國內政治進程等影響,並以此來預測對方未來的行動,常常以戒備心理來警覺其他國家的意圖。另一方面,由於決策者對於對方內部的利益衝突估計不足,從而制約了對於對方政策產生影響的舉措,國家也就不會調用足夠的資源來研究對手國內的派系、政府結構及其重大問題。例如,結盟集團外的國家比結盟集團內部的成員國更趨於認為結盟所具有的穩定性和約束力。「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嚴峻歲月裡,許多人相信德國和義大利之間從 1936 年以來就有著結盟關係,兩個國家之間的政策是協調一致的,在這種政策框架中,它們的每一個行動都是精心策劃和相互同意的。」<sup>⑨</sup>從實際情況來說,德國和義大利之間由於常常懷疑彼此的意圖而各自採取行動。

2. 過高估計自己作為影響者和影響對象的重要性。過高估計自己作為影響者和影響對象的重要性指的是一國的決策者會誇大他們在別國決策者的決策過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由此產生的錯誤知覺就是其他國家所表現出來的不同對外行為。這種錯誤知覺具體表現為,「首先,當對方的行為與行為體預期一致的時候,他就會過高地估計自己的政策影響對方行為的程度。當對方採取友好政策時,該決策者會認為是自身瓦解了對方的邪惡意圖,而實際上對方根本沒有這樣的意圖。其次,當國際形勢動盪多變,雖然行為體過高估計自己產生的影響的認知會減弱,但人們採取的減緩緊張狀態的行動不會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 A 方很容易認為,B 方的行動不是友好的表現,而是 A 自己採取的強硬政策發生了作用。最後,當對方行為與行為體的預期不一致時,行為體就會將對方行為歸為對方國內因素影響的結果,而不認為這是對自己的政策做出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行為體會認為對方試圖損害自己的利益。他不會將對方的行為視為非本意行為或其他事件所產生的副作用。」<sup>⑩</sup>傑維斯進一步分析認為,上述決策者可能出現的錯誤知覺會妨礙國家之間的合作。一方面,當別國採取友好對外政策時,本國的決策者就會因為過高估計自己的影響力而採取有利於對方的政策,然而當自身能力的局限性在實際情況下無法滿足對方的利益需求時,合作就會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如果國家認為受到嚴重威脅,那麼就會加強對對方懷有敵意的認識,從而決策者會更加依賴採取負面的制裁政策,導致決策者進行超出自身能力的政治行動,進一步加大了戰爭的可能性。這種認知導致一國的決策者忽視通過緩和自己的行為而使對方的行為也趨於緩和。當兩個國家之間尚未完全處於敵對狀態時,這種認知取向則會加劇相互之間的緊張關係,決策者將會以這種認知取向預測對方的未來行為,如果不採取強硬措施,那麼自己將會受到對方嚴重的威脅或傷害。傑維斯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英國和



德國為例。他指出,當時的英國和德國的政治領導人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對方之所以採取敵意行動是因為自己的行為,都認定針對自己的敵對態度與自己的行為沒有關係,而是根據對方行為的變化而變化的。

3. 認知失調。認知失調理論認為,人們不僅僅滿足於認識到自己表現出的良好行為和明智決策,還包括人們要盡量減少自身內心的矛盾,即往往會認為沒有被採納的政策有優勢,已經被採納的政策有劣勢。從而產生使人們不安的認知失調現象。於是,人們通過重新調整自己的認識來為自己採取的行動或做出的決定提供充分理由,從而盡量減弱認知失調。根據認知失調理論,傑維斯認為,在國際政治中,認知失調是「決策者所具有的、與自己後來選定的政策相互矛盾的認知」。由認知失調所導致的決策者的錯誤知覺是決策者在決策之後盡量弱化自身的認知失調效應。在決策之後,那些與決策者認知不符的資訊不會得到充分考慮,從而避免產生決策是不明智的知覺。傑維斯認為,減弱認知失調的後果是維持政策的持久性並且會間接地影響其他決策。當決策者輕視某個沒有被採納的目標時,即使在將來形勢發生變化,該目標可以實現,決策者也不會重新採納這個目標。「如果決策者輕視一個沒有被採納的目標,這就意味著即使將來形勢發生了變化,因而這一目標可以得到實現,決策者也不會採納這個目標。」<sup>⑧</sup>

綜上所述,傑維斯發現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心理認知對其外交決策和對外政策的制定會產生重要影響,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錯誤知覺會導致對其他國家背後的動機判斷失誤,進而阻礙了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甚至是國際體系秩序的穩定。

## 二、政治理念對國際合作的影響

羅伯特·傑維斯的錯誤知覺理論表明政治領袖的認知傾向在對外政策目標和行為結果方面起到了關鍵作用,影響了國家對外的政治意圖。如果政治領袖以錯誤認知取向來認識和判斷其他國家的行為將會引發國家之間的衝突甚至戰爭,喪失了本國發展的機遇和空間。對於國際合作來說,合作本身能否建立並得以發展動力就在於一國的政治領袖持有何種的外交理念,這種外交理念是否有利於地區內各國實現共同利益,是否有利於國家之間關係的發展等積極的正向認知,這都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合作關係的建立和發展程度。阿克塞爾曾指出,「很多例子說明長期的相互關係對人們選擇合作的穩定性的重要性」。<sup>⑨</sup>可見,國家之間增進和保持相互關係對現實和未來合作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而這恰恰取決於一國政治領袖的政治思想和行為。只有政治領袖具有積極正向的政治認知才能對國際合作產生正面的推動作用。政治領袖在國際合作中的正向的影響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 (一) 政治領袖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有利於獲得國內民眾支持國際合作,提高各國參與合作的政治意願

外交執政理念是一國外交理念的構成內容。執政理念是指「對執政問題所形成的理論和觀念,是執政主體對其執政活動的理性認識和價值取向,屬於執政活動的意識形態層面及其意識形態的核心觀念,是執政黨圍繞執政目標形成的基本理論、指導思想、理論準則和行為規範,既是產生執政綱領、主張、方略、政策以及工作思路的思想基礎,也是執政活動的理論指導和執政能力的思想基礎。」<sup>⑩</sup>作為一國政黨執政的指導原則,執政理念貫穿於執政黨的全部執政活動中,對執政黨的執政活動起著關鍵作用。對於處於執政黨首要地位的政治領袖來說,執政理念不僅是其鞏固其執政地位的重要基礎,而且還是謀求本國發展的必然要求,更是科學制定和實施對外政策目標的價值取向和行為結果的參考依據。政治領袖在一切對外事務中首先要考慮的就是整個國家民眾的福祉。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所蘊含的不僅是對外部環境的準確判斷,對歷史經驗的總結,更是對國家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的正確認識以及肩負國家和民眾所賦予使命的責任感。因此,政治領袖與時俱進的執政理念能夠將促進本國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其執政興國的核心目標,把國內發展



與對外開放統一起來,在保障民眾利益、尊重民意的基礎上能夠積極地引導民眾對國家利益的定位,從而能夠獲得民眾對國際事務的支援,調動廣泛參與其中的熱情。在此基礎上,政治領袖能夠致力於積極改善與其他國家的關係來為本國發展開闢更多的發展空間,在進行外交決策過程中將傾向於制定有利於合作的對外政策,這就減少了地區內其他國家的不信任感和猜疑,為地區內各國之間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提供了穩定的政治基礎,大大增強了各國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和行動力。

## (二) 政治領袖符合發展潮流的國際格局觀與時代觀有利於國家之間達成合作共識,實現合作共贏

國際格局觀和時代觀是政治領袖觀察和處理國際問題的立足點。當一國的政治領袖能夠對未來社會發展趨勢有一定預期,並且擅於把握世界趨勢和時代特點,對國際格局、時代主題能夠判斷和認識,那麼他就能夠從全域出發考慮問題,對本國的總體戰略、具體目標以及利益關係調整等方面進行遠景規劃。國際格局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外部環境。政治領袖通過對一定時期的國際社會變化發展的特點和趨勢的把握,瞭解國際體系中各種主要政治力量發生作用以及變化趨勢,明確一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時代主題是伴隨國際格局的基本發展趨勢所形成的。在對國際格局有著基本認識之後,政治領袖自身的國際格局觀和時代觀直接影響著其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國際格局觀和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往往使得一國的政治領袖爭取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維護和平的國際秩序來發展本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徹痛使戰後國家無法再肆意妄為地追求自身利益,各國都以「全人類的發展」理念為導向,這就促使國家在確保自身獲得生存與發展的同時還必須要考慮到其他國家和整個國際社會的利益。格托夫指出,「全球化的命題,可以讓人在思考問題時,具備一種更廣闊的視野:首先,它告訴人們,世界經濟是某種單一的一體化單位,儘管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通常是高度不平等的、有時是依賴性的關係,但依賴性往往是相互的而非單方面的。」<sup>⑩</sup>這就意味著,一方面,在全球化時代,儘管國家利益在形式上仍由一國決定,但其實質和內涵早已超出傳統國家利益的定義和範圍,國家利益是由國內利益和國際利益共同構成的;另一方面,國家的根本利益是追求經濟繁榮,但不能再用戰爭的手段來獲取,這就需要一國的政治領袖在對外政策上要合理地追求國家經濟利益。因此,政治領袖所具有的國際格局觀、時代觀以及隨之而來對於國家利益的認知使得政治領袖在注重維護國家利益的同時以長遠戰略利益為目標,從而努力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共同利益,制定和調整有利於合作的外交戰略和政策,積極改善和發展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加強與其他國家的交流,這就為區域合作所遵從的相互尊重、平等互惠奠定了良好的合作基礎。

## 三、政治理念在國際合作中發揮作用的影響因素

政治領袖政治認知的形成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必然影響了政治領袖以什麼樣的態度和認識來參與國際合作以及如何積極地推動合作的形成與發展。

### (一) 政治領袖的個性: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風格

政治領袖的個性對決定他們如何發揮作用也有著重要影響。個性是指「在個體身上經常地、穩定地表現出來的心理特點的總和,包括一個人怎樣影響別人、怎樣對待自己,以及他的可能被認識的內在和外在的品質全貌」。<sup>⑪</sup>政治領袖的個性是其在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來的較為穩定的心理特徵。在認知方面,政治領袖的個性直接影響其對政治事務的直覺,做出決斷的傾向以及對外部環境的反應,從而對政治行為產生影響。詹姆斯·巴伯對自華盛頓以來歷屆美國總統的個性行為進行了考察研究,提出了四種總統類型的劃分,即主動-積極型(適應型)、主動-消極型(強迫型)、被動-積極型(屈從型)和被動-消極型(退縮型),從中體現

了個性對政治領袖的態度、思維和判斷等認知方面的影響。例如,主動積極型(適應型)的總統對自己要求較高、理性,熱愛工作。因而在決策時有著積極的主動性,「對自己決定解決的問題表現出一種強烈的興趣和關注,能迅速地瞭解到他所需要瞭解的事情,並在記憶中貯存大量他認為有用的資訊」,<sup>④</sup>會積極調整自己的目標和戰略以適應現實的需要。如,佛蘭克林·羅斯福、杜魯門、甘迺迪、老布希、克林頓。被動-消極型(退縮型)的總統「是躊躇和不情願地被捲入其政治職權之中的,並且時時對職位賦予他不容推諉的權力持能躲且躲的態度。他情願從政治的衝突和不安定中撤出兵力,使之集中在含糊的原則和程式化的工作安排上。他在政治生涯中的表現從根本上可以理解為一種責任意識,這種意識使其不同於少數採用卑鄙手段參政的人,並引導他去做一個和正統行為的保護者來補償自己於事無補的感覺。」<sup>⑤</sup>巴伯以歷史上的美國總統艾森豪為例。他指出,艾森豪的個性屬於被動-消極型。艾森豪的政治傾向是安於現狀,排斥極端主義、激進和反動,在政治上關注具有原則性的問題,將很多事情都委派給其他政府機構,這種個性使他對自己的判斷缺乏信心而趨於陳腐,缺少了對社會和政治環境的脆弱性的敏感和在必要時為激發緊張的創造狀態而主動使用權力。

上述內容大體說明了個性對政治領袖認知產生的影響。儘管如此,人的個性是一個很複雜的系統,很難確定屬於某種特定的類型,對於任何的政治領袖來說,其個性特徵也往往是多種類型的綜合體,只是必有一種心理屬性是占主導的,從而體現了政治領袖個性的本質特徵。

## (二) 國內政治文化: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根基

阿爾蒙德曾指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感情」。<sup>⑥</sup>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長期的歷史和現實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進程中形成,它不僅是對一國政治形態獨特之處的整體性的反映,而且直接影響著個體的政治行為活動。阿爾蒙德指出,「政治文化影響各個擔任政治角色者的行為、他們的政治要求內容和對法律的反應」。<sup>⑦</sup>在對外決策的過程中,為了制定合理的方案,政治領袖需要對所收集的情報資訊進行分析和判斷,並在綜合考慮國內外形勢之後進行選擇。對外決策行為的結果很大程度上與政治領袖的政治態度、價值觀念和道德感情有著密切聯繫,而這又取決於政治領袖所身處的國內政治文化背景,即體現這個國家的民族特點、歷史傳統、哲學、宗教等。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夠對政治領袖的政治心理認知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因為它也是國家利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以自身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念以及傳統文化等服務於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國家安全,而政治領袖的外交理念、政治傾向和政策偏好是以實現國家利益為根基的。因此,政治領袖在政治心理認知上是不能忽視政治文化因素的,由此在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上也無不體現了本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對政治領袖的政治思想意識與價值取向具有導向作用,通過其自身所具有的內在價值結構,決定了政治領袖如何認識外部環境和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成為政治領袖在對外決策過程中的行為依據,並有助於政治領袖形成一定的外交風格,也給一國外交刻上了區別於他國的文化烙印。基督教新教理念所包含的「美國優越論」和「天賦使命觀」的思想內容一直是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源泉,「它使得歷代美國總統不僅在對外交往中堅信美國的價值觀和制度最為優越,而且把向世界推廣這種價值觀和制度視為自己的使命。」同時,從基督教新教理念中汲取思想養料的自由主義作為美國主導的政治文化價值規範,同樣影響著美國的政治領袖對外交的理解。而所有與此相關的政治文化在政治領袖的外交行為上就表現為「輸出民主」,包含著美國的民主制度、人權、有限政府和政治制度等,其輸出的重點突出主動性意願和行為來加強美國政治文化價值觀的滲透,這從美國歷代總統的外交戰略思想中都可以看出,如卡特的「人權外交」理念、老布希的「世界新秩序」構想、克林頓的「新干涉主義」思維、小布希的「大中東民主計畫」思想、奧巴馬的「巧實力」外交戰略。



### (三) 國家利益: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目標

莫頓·卡普蘭將國家利益概括為「一個國家行為體在滿足國家行為系統的需要時所具有的利益。」<sup>⑩</sup>這些源於國家系統內部的利益需要,主要包括「維持系統基本規則的需要或滿足於子系統所具有的或個人行為體的人格系統所要求的需要」。同時,國家利益也包括環境需要,如防務,「環境需要取決於國際社會的結構和危險敵手的存在與否,但並不隨著內部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國家利益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國內外的需求,因而它直接決定了一國發展的基本方向,而外交政策更是體現了國際層面上國家的發展需求。因此,國家利益對政治領袖的外交決策理念及其行為結果發揮著指導性的關鍵作用,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國家利益是政治領袖設計、制定和推行對外政策的現實依據。國內民眾的最高利益是一國利益根本體現,它使得政治領袖得以明確需要維護什麼以及為什麼要維護。因此,政治領袖的政治認知傾向及其外交決策結果都體現了國家利益的具體內容,是國家利益的集中反映。二是國家利益是政治領袖如何看待國家之間關係的最高準則。在區分敵友關係方面,取決於國家之間共同利益是否大於衝突,是否在根本利益上能夠實現共贏。在確定親疏關係程度方面,國家之間是對抗還是聯合的程度也是取決於彼此之間的利益關係。

### (四) 國內利益集團: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趨向

「一切群體,包括國家在內,都是權力結構。」<sup>⑪</sup>國家權力的多元化使得各種政治力量和利益集團能夠在政府的決策過程中共同發揮作用。根據組織的不同性質,利益集團分為四種類型:即非正規的利益集團、非社團性的利益集團、機構性的利益集團以及社團性的利益集團。本文所指的利益集團是社團性利益集團。它們是「從事利益表達的專門結構,它們是為了表達某些特定集團的目標而專門建立起來的。」<sup>⑫</sup>如工會、為某些商業或工業服務的組織、種族性集團、由不同的宗教派別組織的團體以及為推進某項政治事業的民政改革或外交政策等而建立的協會。多元主義的集團政治理論認為,「集團是個人和大範圍的國家政體之間的仲介,是領袖和民眾之間聯繫的媒介。」<sup>⑬</sup>利益集團以實現共同利益為目標,在政治過程中起到了自身利益表達和聚合的作用,體現了社會公眾的需求,通過遊說、施壓以及提供意見諮詢和資訊情報等方式,將彙聚的利益訴求轉達給各個政黨和政府部門,如立法機構、行政機構等,使得社會問題和爭議提上政治議程,是政府吸取民意和作出回饋的主要途徑,因而對政治領袖的政治傾向和政策偏好以及外交決策產生一定影響,加強了政治領袖及其政黨對公眾的責任,使政策能夠符合實際,貼近民意,這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要求。阿爾蒙德進一步指出,「在滲透性獨裁的體系,為大多數公民和集團所進行的合法的利益表達,局限於提供資訊或可能是申訴疾苦。再就是政府行政機構和政黨中的各類機構性集團可能上面確定的廣大範圍內向上司提出改變政策的建議。較開放的體系,為表達提供了種類繁多的管道。對實行新政策或繼續推行某些政策的要求,是同給予支持的承諾合法聯繫在一起的。」<sup>⑭</sup>對於國際合作而言,利益集團往往關注的是他們在合作中所獲得的收益分配,政治領袖在進行參與國際合作的外交決策時,往往會傾向於追求那些能夠維護和協調滿足利益集團的政策。例如,美國的利益集團與其國內的立法部門、行政部門共同構成影響貿易政策的主要力量。由於這三種力量所發揮的不同作用使得貿易政策具有突出保護性、鼓勵參與性、強調製衡性和追求靈活性等特點。「對於當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訂,美國有72%的公司執行董事表示支持。這些公司的掌權者組成聯盟和國會中意見一致者、農業利益集團及部分環境保護主義者一道加入當局促進該協定的簽訂過程。」<sup>⑮</sup>在發展中國家,利益集團影響政府決策的途徑主要通過提案、所屬的主管部門、直接遊說和利用大眾傳媒,這些方式以直接或間接的形式對我國政治領導人的政治傾向和政策偏好產生影響。例如,利益集團一是通過與人大代表保持一定的聯繫,以便反映其利益訴求;二是通過向所聯繫的人大代表提出建議進而反映給決策機構;三是通過對行使公民監督權和諮詢權等等影響政府決策。當然,政治

領袖和利益集團是雙向的,彼此之間的需求存在著互補關係。

#### (五) 國內思想庫: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參照

精英理論認為,「每個重要的社會群體都會產生它自身的精英,一個社會的精英是那些自發地從社會裡浮現的精英的總稱,包括議員與官僚系統,但範圍遠逾於此。」<sup>②</sup>思想庫的專家、學者是為政治精英提供諮詢服務並影響國家決策的知識精英群體。一般而言,思想庫是指「思想庫就是那些以政策研究為核心、以直接或間接服務於政府為目的、非贏利的獨立研究機構」。<sup>③</sup>也就是說,思想庫的目標是通過自身的研究成果來影響政府機構,並且也起到了監督政府行為的作用。對於政治領袖來說,思想庫在為其定外交決策方面提供了思想管道,在不斷提供新思想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思想理念是政治領袖在進行外交決策時的行動指南,思想庫的宗旨是探求和形成新的政策思想,通過對現實社會政治現象中規律的總結,對未來世界發展的思考和預測,形成相應的政治理念。思想庫的政治理念通過其內部的專家學者為政治領袖制定和落實外交政策提供一種參考依據,是政治領袖形成新的施政理念並認識世界、把握時代脈搏的「思想工廠」。同時,思想庫針對國際關係的需要為政治領袖提供外交決策方案。思想庫能夠對某個國際問題從不同角度進行分析,提出各種建議,使得政治領袖可以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對各種提議進行比較分析,從而權衡利弊,做出合理的判斷和決策。此外,思想庫幫助政治領袖掌握大眾的思想動態,為政治領袖的外交決策提供公眾輿論意見。例如,日本很多學者通過為政府提供決策諮詢甚至直接擔任行政職務來影響政治決策和社會主流意識。而日本首相的政治認知傾向就受到這些學者宣導的政治思潮的影響。近年來,由於現實主義右翼學者在日本的中央政府高層較為活躍,成為日本首相趨於政治右翼傾向的主要推力,因而阻礙了中日關係的發展。

#### (六) 國際環境:政治領袖理念形成的外界環境

任何一個國家的生存與發展都離不開國際體系這一宏觀背景。因此,一國的政治領袖對於如何制定外交戰略以及決策的總體思考和認識也會受到國際環境的影響。國際環境主要是指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包括國際政治格局中以國家為中心的力量分佈狀況及其變化趨勢、本國在國際格局中的地位、世界經濟形勢、國際安全與戰略形勢等。國際環境使得一國的政治領袖如何從認知上把握世界發展趨勢和時代主題。從總體來說,當今國際格局是以多極化格局為特點的基本趨勢穩定發展的,時代主題仍然是和平與發展,在這樣的國際局勢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政治領袖都會意識到將發展經濟作為自身的外交戰略和決策重點,以此致力於維護和平、謀求發展,這就促使參與國際合作的意願較為強烈,通過參與合作努力加強本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從而大大提升了合作的可能性和長遠未來。同時,在國際局勢總體穩定的情況下還存在局部地區的動盪和一些非傳統安全的全球性問題的發生。這也促使一國的政治領袖認識到全球問題的產生會對本國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又不是能由一個國家所能獨立解決的,這需要國家之間的合作治理才能加以解決,這就促使政治領袖在制定外交戰略和決策上既考慮到維護國家利益,也要認識到與其他國家俱有的共同利益,從而為改善了國家之間的關係提供了契機,更為合作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 注釋

① [法]古斯塔夫·勒龐著:《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頁18-19。

② 姜安等主編:《政治學概論(第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頁18。

③ [美]詹姆斯·麥格雷戈·伯恩斯著,劉李勝等譯:《領袖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502。





- ④ 時蓉華著:《現代社會心理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 年版,頁 210。
- ⑤ 張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認知視角理論與方法》,《國際論壇》,2003 年第 1 期,頁 40。
- ⑥ 全國 13 所高等院校編寫組編:《社會心理學》,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頁 129。
- ⑦ 葉浩生主編:《西方心理學的歷史與體系》,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頁 435。
- ⑧ 羅伯特·傑維斯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中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頁 370。
- ⑨ 羅伯特·阿克塞爾著,吳堅中譯:《合作的進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 2007 年版,頁 46。
- ⑩ 趙曉呼、陳陽:《關於樹立正確執政理念的思考》,《理論探討》,2005 年第 4 期,頁 143。
- ⑪ 格托夫著:《人類關注的全球政治》,北京:新華出版社 2000 年版,頁 12-14。
- ⑫ 蔣雲根著:《政治人的心理世界》,上海:學林出版社 2003 年版,頁 125。
- ⑬ [美]詹姆士·大衛·巴伯著,胡傑等譯:《總統的性格》,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頁 260、17。
- ⑭⑮⑯ [美]加布裡埃爾·A.阿爾蒙德等著,曹沛霖等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北京:東方出版社 2007 年版,頁 26、185、188。
- ⑰ 張宏志,鄭易平:《析美國對外政策的政治文化基礎》,《世界經濟與政治論壇》,2014 年第 6 期,頁 103。
- ⑱ [美]莫頓·卡普蘭著,薄智躍譯:《國際政治的系統和過程》,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 1989 年版。
- ⑲ [美]希爾斯曼著,曹大鵬譯:《美國是如何治理的》,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5 年版,頁 608。
- ⑳ 譚融:《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理論綜述》,《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 年第 1 期,頁 10。
- ㉑ 轉引自範思聰:《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過程及其政治解讀》,《江漢論壇》,2013 年第 12 期,頁 37。
- ㉒ 約翰·麥克裡蘭著,彭淮棟譯:《西方政治思想史》,海口:海南出版社 2003 年版,頁 714。
- ㉓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編:《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北京:時事出版社 2003 年版,頁 4。

(Editors: JIANG Qing & LENG Xueyuan)